

两汉时期儒法斗争概述

两汉时期，儒法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在政治路线上，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有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在西汉前期、中期，主要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是巩固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在西汉后期至东汉时代，主要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是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反对世家豪族腐朽统治的斗争。总之，是前进和倒退、革新和守旧、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在这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路线斗争中，先秦法家统一，集权的政治理论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汉时期的儒法论争是一场尖锐而深刻的路线斗争。在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之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两汉儒法论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投降主义和反动的孔孟之道，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罪行，认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一、西汉前期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和儒法论争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他和他的继承者——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

度，继续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

早在刘邦率领农民军进入咸阳推翻秦朝统治时，就命令他的幕僚肖何搜集秦朝的图书律令，作为继承秦制的依据。刘邦统一中国、重建封建政权后，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大体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在中央设立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辅佐皇帝分别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地方设郡、县尉，直隶于中央；在经济制度上，基本上也是沿用秦朝的赋税徭役制度和作为征调赋役根据的编户制度；在法律制度上，肖何以秦律为根据，制定了汉律九章；在兵制上，无论是兵员的征调、训练、宿卫、戍边等各项制度上，也大体是沿袭秦朝兵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汉承秦制”。由于秦制是根据法家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这条政治路线制定出来的，所以“汉承秦制”的具体内容，就是继续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

汉初，高祖、文帝、景帝都崇尚法治，不乐儒术。高祖、惠帝、吕后时代最得信任的大臣如丞相肖何、曹参、张苍等都是从秦时当过掌受律令刑法的县吏出身，吕后以后的文帝、景帝也都喜好“黄、老、刑名”之学，不信儒生。他们表道里法，利用黄老（西汉道家把黄帝、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清静无为”的治术作为陪衬，实际上仍然着重推行法治，认为“德者，治之本”。当时所谓“刑名之学”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所以汉初诸帝基本上是推行法家路线的。

但是，当时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十分嚣张，自秦始皇以来建立起来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还没有完全巩固，面临着被内外反动势力颠覆、分裂的严重危机。

自从汉初以来，盘据北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在东灭东胡（住今内蒙、东北一带的少数民族）、西破月氏（原住今甘肃河西地区）、征服西域（今新疆地区）和北边的丁零、鬲昆（今西伯利亚南部一带）之后，俨然成为北方一霸。侵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它们怀着牧马中原的野心，不断地对西汉发动突然袭击，除攻占河南地（内蒙河套地区）外，还经常入侵北方各郡，抢走无数的牲畜、财物，俘虏大量的人口，严重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公然招降纳叛，勾结阴谋叛乱的诸侯王，大搞颠覆活动，阴谋搞垮西汉政权。比如，汉高祖时，割据北方的燕王卢绾、韩王信、代相陈豨等都先后发动叛乱，投降匈奴；文帝时，匈奴贵族乘诸侯王势力嚣张之际，大举攻汉，一直打到西汉都城长安附近；景帝时，匈奴贵族乘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时，勾结叛乱的诸侯王“合谋入边”，推翻西汉中央政府。如果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野心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奴隶制复辟的局面。所以西汉中央政府和匈奴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封建制和落后的奴隶制之间的矛盾。

西汉前期，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大搞颠覆活动而外，地方割据势力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猖獗。汉初，汉高祖刘邦在陆续消灭韩信、英布、彭越等异性诸侯王的割据势力（楚汉战争中，刘邦曾封掌握兵权的大将韩信等七人为王）之后，错误地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惩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子弟宗族为王，先后分封了燕、代、齐、楚、梁、吴、赵、淮南、长沙等九个王国。这些诸侯王国“跨州连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合在一起，面积差不多和战国时期的六国相等，并有任免官

吏、征收赋税和铸造货币的大权，俨然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这些王国的诸侯王，为了发展他们的割据势力，和代表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工商奴隶主勾结一起，大搞分裂活动，反抗西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反对统一、集权的法家路线，甚至里通匈奴，阴谋发动叛乱。所以他们是盘据在西汉封建政权内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如果他们的分裂活动一旦得逞，统一的封建国家就会倒退到战国时代的封建割据局面。

由此可见，西汉中央政府与内外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是西汉前期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仍然是一场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主张抗击匈奴侵略，还是鼓吹屈辱投降？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还是支持分裂割据？这是关系到巩固国家统一的根本问题，也是当时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那些是古非今、反对革新的儒生们，根据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的“和为贵”的反动观点，编造出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力鼓吹与匈奴“结和论亲”、“以礼相待”的反动谬论，汉高祖时“以口舌得官”的儒生娄敬，就是屈辱的“和亲”政策的炮制者。所谓“和亲”，就是由汉朝把宗室藩王的女儿充作公主嫁给匈奴贵族的首领——单于，每年还得赠以大量的金帛财物，以求结成和好。然而，这种向匈奴贵族年年进贡的“和亲”政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匈奴的侵略气焰，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汉朝发动掠夺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儒生们站在大地主阶级保守

派的立场上，在对待匈奴和战的问题上，既然主张屈辱的“和亲”政策，和勾结匈奴的地方诸侯王一唱一和；对内也必然是站在分裂割据势力一边，反对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以地方诸侯王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是一伙尊儒反法的反动派。为了对抗法家路线，他们尊崇儒术（《汉书·地理志》：“世家（诸侯王）则好礼文（儒术）”），以“聘贤”为名（《汉书·邹阳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极力拉拢儒生，为之出谋划策。比如：吴王刘濞“招致四方游士”（《汉书·邹阳传》），后来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淮南王传》），著了《淮南子》一书，假借宣扬“黄老无为而治”的治术，反对西汉中央集权制度，后来也发动了叛乱。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儒生们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立场。

与此相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当时著名法家贾谊、晁错都曾经先后向汉文帝、汉景帝极力陈述分封制和“和亲”政策的弊病，建议抗击匈奴侵略、削弱藩国势力，和儒家主张“投降”、“分裂”的反动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贾谊在上文帝的《治安策》这篇政论文中，发挥了韩非的“法”、“势”思想，指出：“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法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他把汉朝比作“方病大肿”的病人，“一指之大几如股”，如不削除藩国割据势力，必成心腹之患；因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用分割诸侯王领地，削弱其权势的办法来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他还向汉文帝指出：“今匈奴嫚（慢）侮（侮辱）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丝织品）奉之（纳贡）”“是臣下之礼”，指明儒生们炮制的“和亲”政策，实际上就是向匈奴贵族纳贡称臣的投降路线。所以他极力激发汉文帝不要甘作“戎人（指匈奴贵族）诸侯”，要发奋图强，抗击匈奴侵略。在《过秦论》这篇政论文中，贾谊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他继承了法家进步的历史观点，肯定了商鞅变法和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中国的巨大历史功绩，颂扬了秦始皇抗击匈奴侵略，使匈奴贵族“不敢南下而牧马”的抗战路线。但是，他受汉朝儒生的影响，对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这一打击复辟势力的厚今薄古措施，加以否定，则是错误的。

和贾谊大约同时的法家晁错，也极力主张抗击匈奴侵略、削弱分裂割据势力。他向文帝提出抗击匈奴的侵略，以西汉之长制匈奴之短，驳斥了儒生们宣扬的匈奴不能战胜的神话；并且建议在靠近匈奴的沿边一带，迁徙内地人民去进行屯田、筑城，以巩固边防。文帝采纳了贾谊、晁错的建议，徙民实边，并且亲自主持训练军队，作抗击匈奴和镇压诸侯王叛乱的准备。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提升他为御史大夫，积极进行削藩。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汉书·晁错传》），并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国割据势力的法令三十章。

公元前一五四年，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七国发动了叛乱，并且勾结匈奴，妄图里应外合，推翻西汉中央政府。他们的反动气焰虽然嚣张一时，但是由于他们的分裂行为是逆时而动，不得人心，所以仅仅三个月就失败了。七国之乱平定

以后，西汉政府把任免官吏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从此，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开始逐渐地削弱了。

二、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西汉中期的儒法大论战

西汉中期武帝、昭帝、宣帝统治时代，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儒法论争也更加激烈起来。这一时期，斗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抗战和投降、统一和分裂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上，所以它是西汉前期儒法论争的继续发展。

公元前一四〇年汉武帝刘彻继位时，经过汉初六十余年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国家积累起雄厚的经济力量；同时，经过文、景时代的加强战备和削弱藩国，军事力量有所增长，割据势力也开始削弱，为汉武帝时代进一步贯彻统一、集权的法家路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狂，仍然存在着旧势力复辟的危险。

当时，匈奴奴隶主经过一系列掠夺之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侵略活动也更加频繁，西汉中央政权和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空前尖锐的地步。不打垮匈奴侵略势力，国家的统一是得不着保障的。

不仅北边的匈奴贵族虎视眈眈，妄图把西汉各族人民变成他们的种族奴隶；盘踞在西汉政权内部的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也在暗中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西汉中央政府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地方诸侯的权力虽然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他们的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仍然拥有发动叛乱的潜在力量。因为他们还占据着“连州跨郡”的广大封地；

还招揽了大批反动儒生为之出谋划策；特别是他们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工商业奴隶主勾结在一起，结成反对西汉中央政府的反动同盟，共同垄断冶铁、煮盐、铸钱等重要经济部门，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积累起大量的财富。这就是分裂割据势力借以进行分裂活动、发动叛乱的物质基础。

自从西汉初期以来，地方诸侯和工商奴隶主就依仗财势、利用西汉政府开放山海的机会，霸占了沿海的盐场和盛产铁矿的矿山，使用大量的奴隶劳动煮盐、冶铁、冶铜、铸钱，积累起雄厚的经济力量。一些地方诸侯王，如吴王刘濞，就是利用他所把持的“山海之利”，煮盐、铸钱，积蓄力量，招兵买马，发动叛乱。而那些工商奴隶主，除了通过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放高利贷、买卖奴隶以牟取厚利外，也是封山占水，冶铁、煮盐，大发横财。他们的财力甚至超过王侯，“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由于西汉前期以来继续推行法家“重本（农）抑末（商）”打击奴隶制残余的政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以限制（如限制商人衣丝、乘车、作官等），因而他们和西汉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反对中央集权制度，“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汉书·食货志》）；反而以财力资助诸侯王搞分裂割据活动。所以从政治上的集权进一步发展到经济上的集权，加强封建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摧毁地方分裂割据的经济基础，乃是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迫切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中央政府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前期的法家路线和各项政策，在著名法家桑弘

羊等人的建议下，制定出抗击匈奴侵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以及为这一条政治路线服务的各项政策，坚决打击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维护国家的统一。

在政治上，继续执行文、景时代的削藩政策。汉武帝于公元一二七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废除）、徙（迁徙），而藩国自析（由大变小）”（《汉书·诸侯王表序》）。这是法家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政策的继续发展。这样，便从王国里分出许多郡管辖的小侯国。这些侯国的列侯，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于是，诸侯王的领地便由大化小，中央直辖的郡县越来越多了。后来，汉武帝在宣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用“表儒里法”的治术把儒生搜罗在中央政府周围之后，又颁布了“左官律”（《汉书》原注：“人道尚右，今舍天子仕于诸侯，故谓之左官。”）和“附益法”（《汉书》原注：“言其背王法而厚于私家。”），用贬降官职甚至加以惩治的办法来打击那些投靠诸侯王的反动儒生，限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但由于儒生们是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言人，那些被征辟、推荐到西汉朝廷去做官的儒生，仍然坚持其投降、分裂的反动路线，反对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所以汉武帝并不信任这些屁儒。汉武帝时代参加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实权人物大都是法家。这就保证了法家路线的贯彻和执行。

在军事上，法家桑弘羊为汉武帝“画匈奴之策”，提出“守御征伐”并重，即采取积极防卫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还提出“断匈奴右臂”，即支援受匈奴贵族奴役的西域各族人民彻底打垮匈奴侵略势力。根据这项决

策，汉武帝根据法家“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篇》）的精神，不拘资历，选拔了奴隶出身的青年将领卫青和英勇善战的霍去病等担任主将，对匈奴侵略势力发起三次（公元前一二七年，前一二一年，前一一九年）猛烈的反击，打垮了匈奴军队的主力。同时，汉武帝还根据桑弘羊“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这种加强战备的方针，在沿边一带进行屯田、筑城，徙民实边，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巩固了胜利的成果。从此，匈奴侵略势力因受到沉重的打击而逐渐衰弱下去。抗击匈奴侵略取得的胜利，在巩固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向前发展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经济上，汉武帝任命坚决贯彻他的政治路线的法家桑弘羊担任大司农、治粟都尉官职，主持经济上的革新工作。桑弘羊在主管全国经济事务后，先后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以及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各项财政经济措施。盐铁官营，就是把原来由地方诸侯王和工商奴隶主们操纵的盐铁大权归西汉中央政府所有，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来经营管理，凡是私自冶铸铁器或私自煮盐的，一律处以重刑，并没收货物。平准，就是把过去由工商奴隶主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大权归为西汉中央政府控制，由大司农在京城长安设立平准官，“尽笼（收购）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汉书·食货志》），以平抑物价，以免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地设立运输官，由政府制造运输工具把各地土特产运到京城，以免商人从中牟取暴利。算缗，就是向工商奴隶主征收财

产税，规定他们自报财产，每二千钱抽一算（一百二十钱）；凡是隐瞒不报或是呈报不实的，都可以进行告发，以没收财产之半赏与告发人，称为告缗。在杨可主持告缗事务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中家以上（中产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抵皆遇告。……得民（工商奴隶主）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矣”（《汉书·食货志》）。此外，还禁止私人铸钱，进行币制改革，把铸造货币的大权收归中央。

通过上述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不仅给予那些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分裂割据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借以进行分裂活动的经济基础，使自秦朝以来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更加稳固；而且这些措施的实行，还解决了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出现的财政困难问题，保证了战争中的军需供应，对于支援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取得胜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抗击匈奴侵略、巩固国家统一这个对历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进程中，汉武帝、桑弘羊等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但是，汉武帝、桑弘羊在推行其坚持抗战、加强集权这条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路线时，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在尖锐、激烈的儒法斗争中实现的。自从汉初以来，儒法两家在如何对待匈奴侵略和内部反动势力分裂活动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抗战和投降、统一和分裂两条不同的路线分歧。武帝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顽固地站在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的反动立场上，极力鼓吹投降卖国的“和亲”政策，胡说什么“‘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悦）也，独可说（悦）以厚

利，结之于天耳”（《汉书·匈奴传赞》）。他还拚命反对加强中央集权的盐铁官营政策，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实际上就是要归于分裂割据势力。和董仲舒同时的另一个孔老二信徒、御史大夫卜式也是极力反对盐铁官营，攻击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汉书·食货志》），有失政府体面，公然向武帝提出“烹（煮死）弘羊”，要把法家桑弘羊置诸死地。但是，汉武帝并不相信这些屁儒的话，始终坚持法家路线，信用法家桑弘羊等人，因而能够排除儒家反动路线的干扰，取得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的胜利。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动的儒生们对于他们反动路线的失败是不甘心的。汉武帝死后，以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尊孔派，纠集了各郡国的儒家代表人物——贤良、文学，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在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以辩论盐铁官营为名，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霍光的指使下，这伙反动儒生的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极力宣扬其分裂倒退、卖国投降的反动路线和复古思想，拚命攻击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恶毒地咒骂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敢于斗争的反潮流精神，舌战群儒，和反动儒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发挥了法家变法革新的传统思想，驳斥了儒家宣扬孔孟之道、攻击法家路线的种种谬论，批判了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从而捍卫了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予反动儒生以迎头痛击。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痛斥了贤良、文学们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叫嚣“罢盐铁，退权利”，妄图破

坏国家统一的反动谬论。他指出：私家垄断盐铁，以致“私门成党”，“成奸伪之业”，“而逆节之心作”（《盐铁论·禁耕》）乃是分裂割据势力发展叛乱的经济基础；而盐铁官营乃是抗击匈奴侵略的“安史足用之本”，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的“国家大业”。如果废除盐铁官营，就是助长了地主分裂割据势力，危害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揭露出儒生们搞分裂倒退、为分裂割据势力服务的反动立场。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贤良、文学们诬蔑汉武帝抗击匈奴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废道德而任兵革”（《盐铁论·本义》）等种种宣扬卖国投降的反动谬论。他提出：匈奴侵略是汉朝的心腹大患，“汉之有匈奴，譬如木之有蠹，（音杜，蛀木虫），如人有疾，不治则寝（音侵，逐渐）以深”（《盐铁论·世务》）。他总结了汉初“和亲”政策的历史教训，从匈奴奴隶主贵族“背信弃义”“百约百叛”的事实中，指出：必须“兴义兵以诛暴强”，彻底打垮匈奴侵略势力。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批判了贤良、文学们宣扬礼治，诋毁法治的复古思想和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潮。他阐发了法家“法者因法”的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出：“礼让不足以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盐铁论·诏圣》）。他热情地歌颂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商鞅等的丰功伟绩，回击了反动儒生对于法家代表人物的攻击和诬蔑。他继承了前辈法家的进步历史观点，批判儒生们是古非今、鼓吹“法三王”（夏、商、周）这种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思想，戳穿他们宣扬复古的罪恶目的，是“饰虚心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盐铁论·遵道》），就是为了搞

分裂，搞复辟。他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儒家的老祖宗孔老二，揭露其“知时不用犹说”，“知困而不能已”，“不知见欺而往”，“因辱不能死”（《盐铁论·大论》）这种顽固（“强”）、贪婪（“贪”）、愚蠢（“愚”），无耻（“耻”）的反动本质。

桑弘羊对儒家反动路线和反动思想的深刻批判，把那些强词夺理的贤良、文学们驳斥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他们妄图借反对盐铁官营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桑弘羊虽然被霍光杀害；但是他所捍卫的法家路线，在昭帝、宣帝时期仍然继续推行下去。

盐铁会议上这场激烈的大论战，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可以说是两汉前期、中期路线斗争的一次全面总结。由于法家坚持抗战，巩固统一的政治路线，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战胜儒家的反动路线，起了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西汉儒生董仲舒之流和贤良、文学们的衣钵，妄图开历史之倒车，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破坏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于把林彪这个绊脚石碾得粉碎！螳臂当车，只是自取灭亡而已。

三、西汉后期至东汉时代的尊儒反法思潮和儒法论争

西汉后期元帝、成帝以后，由于最高统治者任用儒生，政治日趋腐败，武帝时一度受到打击的豪强地主势力又重新嚣张起来，到处出现有“人君之尊”、“公侯之富”的豪强大地主。他们和一些把持朝庭政权的官僚贵族结成了一支继地方诸侯王而起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有的官僚本身就是任州县称王称霸的豪强大地主，这就是最早的世家豪族，比如西汉后期世代掌握朝政的外戚王氏家族，就是出身魏郡元城（河南濮阳）的豪强大地主，这股大地主保守势力伙同工商奴隶主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广大的自耕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在“豪强大姓，蚕食无厌”（《汉书·鲍宣传》）的情况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公元十七年，终于爆发了以赤眉、绿林、铜马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这次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妄图复古改制、开历史倒车的王莽政权；但是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却被钻进农民军的豪强地主刘秀篡夺了去，建立起东汉王朝。

这个代表豪族利益的封建政权建立以后，便向农民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军；并给予豪族出身的官僚贵族以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促使豪门大族的势力更加急剧地发展起来。他们不但凭借特权以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霸占了全国大部分的土地和劳动力，垄断了地方政权；而且还以地主势力为基础，进一步控制了朝庭大权。他们当中一些权势最显赫的大族，世袭高

官，把持朝政，成为世代公卿的世家豪族。他们是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最顽固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西汉后期以来，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兴起，适应这个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保持既得的特权地位、反对社会变革的政治需要，儒家唯心主义思潮也就逐渐地盛行起来，开始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的地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老二也被世家豪族和帮闲的儒生们吹捧为“神圣卓绝”的封建“圣人”。西汉末年，豪族地主代表人物王莽等人就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儒家唯心主义思想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公元元年，在王莽的主持下，西汉政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王莽传》）。豪族势力操纵下的东汉政权，效法王莽大搞尊孔读经。公元五十五年，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图谶是儒生们假造的预言）于天下”（《后汉书·光武纪》），极力宣扬儒家的天命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把它宣布为钦定的正统思想。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桓谭等人都是因为反对谶纬（纬是用阴阳五行迷信解释儒家的经典）得罪，给加上“非圣无法”的罪名，几乎被处死。公元七十二年，明帝刘庄亲自到曲阜“朝圣”，祭祀孔丘，还“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公元七十九年，章帝刘烜亲临洛阳白虎观召集儒家代表人物“讲议王经同异”。会议钦定的《白虎通义》，进一步发挥了孔孟唯心主义哲学，胡说什么孔老二“为汉制作”，他的经书是为汉朝立法的。不久，章帝又率领群臣到曲阜祭孔，向孔老二顶礼